

现实精神与现代手法的融合

— 论九叶诗派的艺术实践

朱彤*

<目次>

- 一。序
- 二。九叶诗派的艺术实践
- 三。结论

一。序

九叶诗人主要接受二、三十年代以来西方现代诗潮的同步影响而进行的自觉的现代诗歌艺术探索，使得中国新诗与当代世界诗潮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同步发展。他们的努力的确使得中国新诗向着现代化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而尤其可贵的是，他们这种自觉的现代诗艺的探索并没有使他们困于象牙之塔中苦苦吟哦。他们反对走出艺术，但同时也反对走出人生。他们强调忠于艺术良心，但同时也强调忠于时代。这样，他们的诗艺探索便始终与对时代现实的关注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一种将艺术创新精神与时代使命感、诗人的个性与社会性统一起来的特征。

二。九叶诗派的艺术实践

九叶诗人是一群严肃的生活的思索者和参与者。尽管他们最初也是从抒写儿女哀怨般的人生感怀而走上诗坛的，其早期的创作中，由于各自思想认识和生活

视野的局限，也表现出激烈的时代生活的某种隔膜，如陈敬容的《窗》、郑敏的《寂寞》等诗作就都表现了诗人那种在现实环境中深感郁闷失落而哀怨、空虚的情绪。但九叶诗人作为有着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民主倾向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不可能抛弃其忧时伤世的社会责任感、时代使命感与坚定的民族意识的。在坚持对现代诗艺的不懈探求的过程中，他们绝不愿冷漠地对待人民的苦难命运。于是，他们必然会“开始向自己的世界外去找寻世界”。（杭约赫《启示》）随着民族苦难的日益深重，九叶诗人们自己也处于颠沛流离的境遇之中，他们的诗也就愈来愈贴近社会现实，思考着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尤其是随着解放战争时期的到来，《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两个诗刊的创办，更标志着九叶诗派真正向社会现实的切近乃至突入。在《中国新诗》第一集的代序《我们呼唤》中，他们这样呼唤：“到处有历史的巨雷似的呼唤：到旷野去，到人民的搏斗里去，到诚挚的生活里去，它以它的光叫我们知道：只有在历史的光耀里才有人的光耀，人的存在只因为他的严肃的工作，人的存在只因为他的自我牺牲——在生活里也在文艺与诗的创作里。我们是一群从心里热爱这个世界的人，我们渴望能拥抱历史的生活，在伟大的历史的光耀里奉献我们渺小的工作，我们都是人民生活里的一员，我们渴望能虔诚地拥抱真实的生活，从自觉的沉思里发出恳切的祈祷、呼唤并响应时代的声。”[1]杭约赫与唐祈在《中国新诗》第二集的编后记里更公开地强调并号召诗人们“更强烈地拥抱住今天中国最有斗争意义的现实，”“我们愿意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人，在最复杂的现实生活里，我们从各方面来参与这艰苦而光辉的斗争，接受历史阶段的真理的号召，来试验我们对于新诗的创作”。

可见，就整个创作历程来看，九叶诗人更多地是将自己对于现代诗艺的探索与时代使命感、社会责任感结合在一起，而且愈到后来则愈加强烈。尤其是四十年代后期，当方生与未死、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倒退、正义与反动在血与火的中国大地上进行着最后的殊死大搏斗的时候，九叶诗人更是以自己坚定的选择汇入了民主革命与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的洪流。他们把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揭露与对未来民主光明的讴歌同他们对现代诗风的探索结合起来，展现出新旧更替期整个社会山雨欲来、动荡不宁的情势，抒发出“祈求一片雷火”的斗争基调。

* 韩国又松大学孔子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

所以，在九叶诗人的创作中，无论是对于民族苦难与命运的深沉思索，还是对于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无论是对于黑暗现实的猛烈抨击，还是对民主光明的热烈讴歌，都显示出他们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而这种使命感与责任感的完成又是与他们的现代诗风结合在一起，与他们建设现代化新诗的探索密不可分的。这便显示出了他们的诗歌创作的独特的历史价值与美学价值。

郑敏的《时代与死》用诗人自己的言语对特殊时代中的生死观念作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形象阐发，她说死者是一座引渡的桥梁，“为了带给后来者一些光芒，/让自己的眼睛永远闭上”。因此，这样的死便“不再表示着毁灭，恐怖，/和千古传下来的悲哀，/不过是一颗高贵的心，/化成黑夜里的一道流光，/照亮夜行者的脚步。/当队伍重新前进，/那消逝了的每一道光明，/已深深溶入生者的血液，/被载向人类期望的那一天。”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郑敏总结到：“倘若恨正是为了爱，/侮辱是光荣的原因，/死也就是最高潮的生”。诗人在这里把生的涵义从个体生物意义扩大到一个国家和民族复兴的象征意义上，因而具有一种历史的质感和厚度，它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经过极其痛苦的曲折、徘徊、追求，失去和牺牲了许多宝贵东西后获得的一种新的人生哲学。在《生的美：痛苦·斗争·忍受》中，郑敏也有同样的表述：“只有当痛苦深深浸透了身体，/灵魂才能燃烧，吐出光和力。”如果说郑敏的这种体验带有一种哲人的冷静的话，那么，穆旦作为自觉的现代主义者，更以一种现代人的精神痛苦抒写着视死如归的新篇章：“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这是穆旦《森林之魅》的境界，诗人通过对自然境界的描绘而形象化地阐明了一种哲理：在人类的历史里的死亡也就是在自然的历史里的新生。以这种深沉的思想与融和的情感，诗人完成了他超越的哲学。这是对抗日战士的壮烈战斗的深情礼赞，也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崇敬与肯定。因此，“没有虚妄的伤感，只有更深的坚忍”的穆旦，在苦难的时代里，作为受难者同时也是勇敢的献身者，把深挚的爱献给了同样经受着苦难的祖国和人民，对民族命运进行着独特的思考。“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在耻辱

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穆旦《赞美》）这样的诗作，所用意象饱和着令人颤栗的紧张感，厚重深沉，朦胧晦涩，着想奇异，热烈而又冷漠，既有较强的现实内容，又有较重的知性成分，富有现代派色彩的表现与对于民族命运的思考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九叶诗人自喻为以血来化作声音、“要以全生命来叫出人民的控诉”的“布谷”。“二十年前我当你/是在歌唱永恒的爱情，”可二十年后的于今，“你一声声是在诉说/人民的苦难无边”。（辛笛《布谷》）诗人笔下的布谷浇铸了浓烈的主观情思，甚至已成为诗人自我的象征体。诗人抒写的不再是单纯的布谷，也不再是超离布谷的单纯冥思，而是布谷与自我契合后达到的情绪体验与人生体验的凝聚。在九叶诗人那里，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成为他们抒写的重要内容，他们对其寄予了深厚的人道主义同情。辛笛的《风景》这样写道：“列车轧在中国的肋骨上/一节接着一节社会问题/比邻而居的是茅屋和田野间的坟/生活距离终点这样近/夏天的土地绿得丰饶自然/兵士的新装黄得旧褪凄惨/惯爱想一路走来行过的地方/说不出生疏却是一般的黯淡/瘦的耕牛和更瘦的人/都是病，不是风景！”诗中意象的象征意味显得十分新颖、独特。一条条枕木是“中国的肋骨”，一节节车厢是一个接一个的众多社会问题。茅屋和坟墓竟比邻而居，人们的命运是何其短暂而悲惨：“生活距离终点这样近。”诗人的旅程同时也是中国的社会现实：“都是病，不是风景！”诗人表达了对黑暗现实的愤懑和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同情，而这种愤怒的情绪与深切的思索乃是凝结于一系列凄清的意象上，达到了抽象观念与具体形象的统一，感觉化与知性化的统一，加上不同于日常语言的习惯程序的虚实相嵌的语言技巧，便铸成了特有的奇峭、凝炼与简隽，使诗闪烁出一种精警沉凝的奇妙火花。郑敏的《人力车夫》称道人力车夫是“这古老土地的坚忍的化身”，进而也揭露了他们“在这痛苦的世界里奔跑”乃是“科学的耻辱”，从而呼喊人们的“反省”，祈求人们为他们“踏出一条坦途”来。杜运燮的《草鞋兵》悲叹着：“你苦难的中国农民，负着已腐烂的古传统/在历史加速度的脚步下无声死亡，挣扎”。唐祈的《故事》、《游牧人》、《严肃的时辰》、《女犯监狱》、《挖煤工人》；袁可嘉的《难民》等等都抒写着对苦难中的人民的凄惨生活的同情与关注。

而在九叶诗人的诗作中占据了最大比重的则是他们对未来光明的热烈期盼与讴歌，对黑暗现实和腐败政治的无情的嘲讽与批判。

抗战后期，到过延安的杭约赫在“阴雾蒙蒙，狐鼠猖狂”（《寄给北方的弟弟》）的山城重庆写下了《神话》、《拓荒》、《寄给北方的弟弟》等热情赞颂革命圣地延安的诗篇，表达了对“那金色的高原上”“象块巨大的宝石，/在金河的岸上放光”的神奇的土地的热烈向往：“千年的桎梏一齐打碎，/人类在那儿有了新的希望。/千万人心里亮着它的名字，/千万人冒着死生去寻访。/那怕山高路遥、雨狂风暴，/象江河汇流海洋，谁的心不朝向太阳？”（《神话》）进入解放战争后，九叶诗人更以自己的热情期待着人类更为光辉灿烂的黎明，用他们热情的歌喉呼唤着这一时刻的早日到来。辛笛呼喊：“春天这就来/冬天你走不走去？”“而和平，和平/就该永远冻结在/阴黑无底的鼠穴里？”（《春天这就来》）陈敬容则想攀上黑夜的翅膀飞翔，“直到我力竭而跌落在/黑夜的边上/那儿就有黎明/有红艳艳的朝阳”。（《黄昏，我在你的边上》）杜运燮在1948年写于新加坡的《雷》中，以一切自然的和人间的迹象连续喊出了十二个“他们来了”的惊喜的欢呼声，向人们昭示了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自由、和平的新中国正以不可阻挡的历史步伐向人们走来！唐祈深深地懂得自己的角色使命：“我竟是诗人，历史学家，预言家，/最末的时辰终归来到，/我还有更大失声的/欢呼，大笑！/当另一支军队/踏着六尺的阔步开到”。（《最末的时辰》）唐湜用现代派的手法抒写着“一个新人类的早晨/已经发亮”的历史现实。（《手》）九叶诗人对光明未来的呼唤并不流于单纯的呼喊或直接的宣告，而常常是以他们一贯的风格将对光明未来的呼唤与诗美的形象密不可分地融合在一起。杜运燮的《雷》是如此，唐祈的《最末的时辰》和唐湜的《手》是如此，陈敬容的《力的前奏》更是如此：“歌者蓄满了声音/在一瞬的震颤中凝神/舞者为一个姿势/拼聚了一生的呼吸/天空的云、地上的海洋/在大风暴来到之前/有着可怕的寂静/全人类的热情汇合交融/在痛苦的挣扎里守候/一个共同的黎明”。诗人用一系列生动的意象铺陈表达了一个主旨：积蓄力量，迎接黎明的到来。象征的意蕴是很深的。而在具体写法上，则是把抽象的“力”和具体形象的“歌者”、“舞者”、“天空的云、地上的海洋”相联结，三个连续而又各自独立的暗喻本

身已经创造了一种强大的艺术氛围，最后一个思想的引爆就凝聚了极大的能量，而前后一气呵成的艺术构思又表现出现代诗艺术整体性的美。

对光明未来的热烈呼唤正是基于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于是我们看到，九叶诗人一边以巨大的热情呼唤黎明，一边也以极大的愤懑表现着对黑暗现实与腐朽的反动势力的强烈的诅咒、讽刺和猛烈的抨击。他们给自己确定的历史使命便是：“我有一分气力总还是要嚷要思想/向每一个天真的人说狐狸说豺狼”。（辛笛《回答》）于是他们愤慨于“国情和人事，翻不尽的波涛，/凋尽了童心，枝枝叶叶，/全是悲愤和苦恼”。（陈敬容《从灰尘中望出去》）他们从呼喊“黑夜将要揭露/这世界的真面目/黄昏是它的序幕”（陈敬容《冬日黄昏桥上》）到抗辩“大地最善于藏污纳垢，/却容不下一粒倔强的种子。”（陈敬容《抗辩》）杜运燮的《追物价的人》嘲讽抗战时期国统区物价飞涨的现实，诗人用“我”的口吻，一方面写“抗战红人”——飞涨的物价，另一方面写这“红人”对“我”的经济和心理压力，迫使“我”丢掉妻子女儿，奋不顾身地去追逐它。在典型的奥登式的人物心理分析和轻松幽默的形式之中，对现实的批判程度也愈加强烈。杭约赫以《噩梦》、《感谢》、《最后的演出》等带有强烈讽刺意味的诗作将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发动内战、反共反人民的独夫民贼蒋介石，显示了人民的觉醒和奋起反抗。“理性教会了我们思想，/反叛的手，将如森林，/是你训练成我们粗暴，/以最猛的速率向你退却。/……感谢你给了我们法则，/转向你，夺取我们合理的生活！”（《感谢》）“爆竹、悬旗、欢呼，你明白/这掩压不住四周的风声雨声；/你痉挛的笑，笑得发抖。你明白/我们是用绳子拴来的观众，/以充血的眼睛来欣赏你/最后一段演技，亿万个/呼号和掌声，在我们召唤里等待。”（《最后的演出》）唐祈的《雾》抨击“那些阴谋家、战略家、军火商人/利用和平作白色烟幕，/怎样在用人骨划着地图”，向人民揭示出“灰色的和平下面黑暗的/一片战争的泥泞。”唐湜用现代派手法写着《骚动的城》，表现人民的反抗与斗争，更向反动的统治者宣布：“当黑夜掩起耳朵/宣判别人，就在他背后/时间吹起了审判的喇叭。”（《背剑者》）袁可嘉的《上海》、《南京》等诗从总体上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予以否定和嘲讽。诗人采用西方十四行诗的格式，学习奥登的手法，运用形象和象征，用客观冷静的笔

调，以讽刺和机智相结合的手法来抨击反动统治。诗人没有用一般的控诉、咒骂的方式，但却揭露得深刻，讽刺得有力。其用字造句和意象经营都具有现代风格。诗人正是以这样的诗作来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他自己大力提倡的“新诗现代化”与“新诗戏剧化”的理论主张。唐祈的《时间与旗》和杭约赫的《复活的土地》是四十年代国统区最有影响的长诗力作，它们都涉足重大题材，以一种恢宏的气势、力度和壮阔的场面、格局表现黑暗统治、社会的腐败与反动，显示出对于人民的觉醒、斗争与胜利的坚定信念。《时间与旗》是1948年中国历史的记录。它的横切面的空间是旗，那铺盖着1948年中国历史空间的旗。它的纵向是时间，这包含了古老的过去，当时混乱的现实及发展中的未来。诗篇把宏大的气势与深广的内蕴，把现实的感悟与历史的纵思做了高度的衔接，因而显得内涵博大而又坚实有力。在诗的开端和结尾，诗人都用时间和空间进行着诗的织锦：“过去的/时间留在这里/这里不完全是过去，现在也在内膨胀/又常是将来，包容了一致的/方向，一个巨大的历史形象完成于这面光辉的/人民的旗”。这首诗无论从艺术和思想深度、感性的丰富和情绪的激荡等方面来说都是五四以来为数极少的优秀长诗之一。诗的结构相当完整而又不拘泥，可以看出作者诗思的流动。它从浪漫主义诗中吸取了激情和理想，从现实主义吸取了对细节描写的重视，从现代主义接受了打乱空间的跳跃、拼贴、蒙太奇等表达手法。其关于时间的哲学思维，让人联想到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而诗中写到花园中的鸟儿和沉思的树时所含的象征韵味更使人联想到《四个四重奏》中“燃烧后的诺顿”一章中艾略特的有关描写。诗人将重大的时代主题的揭示与多种艺术手法相结合的探索的确是相当成功的。《复活的土地》长达六百多行，是一部涵盖整个时代的巨作。从世界的反法西斯战斗开始，抒写到“都市的花朵”上海——“饕餮的海”，从抗日战争胜利到解放前夕的景象，一直到“土地的复活”，新世界从人们的觉醒里到来。它是一部以飞跃的联想与跳荡的节奏写成的一幅现代风格的宏伟意象画，容纳了战争、政治、社会历史的巨大内容。长诗所极力表现的主题是战争中“人”的问题，人的地位、命运和力量。诗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解放战争的背景下，展开了在现代“文明”都市里“人”的失落、寻找、夺取的主题，而最后，诗人终于在人民中找到了“自我”，同时也

认识了人民。对于“人”、对于“自我”的失落和寻找，是西方现代派文学表现的一个普遍主题，但在中国新诗史上，这样的主题却还没有人表现过。《复活的土地》的意义与成就即在于，它不仅表现了这样的典型的“现代”主题，而且是与中国的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既不是置现实世界于不顾而思考人生的奥秘，也不是只写群体而没有个人。诗人以一个懂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眼光去透视社会现实，抒写了一代知识分子心灵的历程。整个长诗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俯仰自如，语言凝练，表现了善于艺术概括的才情和巨大的艺术魅力。

九叶诗人在忠于艺术与忠于现实一致性的前提下探求诗歌艺术美的创造，他们的诗歌追求，既注重现实观照，又保持了心灵自由；既创造了把握时代心灵脉动的历史价值，又以超群的艺术探索，特别是写实与象征结合的手法、饱含知性的意象运用，强化了诗的美学价值与美感力量，从而矫正了走出人生与走出艺术的两种偏颇，发现并预示了中国现代诗歌艺术创造的某种必然的历史法则，即真正的诗应该创造一种审美价值，在审美价值中映射出社会价值，并使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尽可能完美地统一起来。他们在中国新诗发展处于与外国艺术相对隔绝的四十年代，以现代艺术的引进大大丰富与提高了新诗的创作活力，而在引进的过程中着眼形式，又力求形式与现实交合并加以改造，大胆融汇了现实主义精神与西方现代派艺术手法，从而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具有民族特色和现代艺术魅力的中国诗歌。这是他们推动新诗发展最为成功的探索。而且，这种处理现实与艺术、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之间的关系的原则与方法，即便在今天也有着一定的启迪意义。九叶诗人的探索与成功告诉人们：现实主义与作家的主观或自我、诗的社会内容与诗人的个人抒情都不必一定对立起来；现实主义不是封闭的理论体系或创作方法，现代主义也不是不可为我所用的洪水猛兽。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有机结合与融汇，往往会开出更加烂漫的艺术之花，结出更加丰实的艺术之果。

三。 结论

九叶诗人在自觉探索现代诗歌艺术的同时又始终关注民族振兴与新生的现实斗争。在九叶诗人的创作中，无论是对民族苦难命运的深沉思索，还是对于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无论是对于黑暗现实的猛烈抨击，还是对民主光明的热烈讴歌，都显示出他们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而这种使命感与责任感的完成又是与他们的现代诗风结合在一起，与他们建设现代化新诗的探索密不可分的。这便体现了一种将艺术创新精神与时代使命感、诗人的个性与社会性统一起来的特征，从而显示出了他们的诗歌创作的独特的历史价值与美学价值。九叶诗人的探索与实践，一定程度上矫正了中国新诗走出人生与走出艺术的两种偏颇。他们大胆融汇了现实主义精神与西方现代派艺术手法，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具有民族特色和现代艺术魅力的中国诗歌，从而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展示出一种新的方向。他们那种处理现实与艺术、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之间的关系的原则与方法，即便在今天也有着一定的启迪意义。

< 参考文献 >

《我们呼唤》，(代序)，《中国新诗》第1集，1948年6月。
约·祈，《编辑室》，《中国新诗》第2集，1948年7月。

< Abstract >

At the same time the nine-leaf poets explored the modern poetry art, they kept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 realistic struggle for national revitalization. In their composition, they reflected on the nation's hard fortune and showed sincere sympathy with people of lower classes. Besides, they fiercely attacked the dark reality and eulogized the democratic

brightness. Both of the two aspects mentioned above reflected their strong senses of mission and du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wo senses wa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ir modern poetic style and their exploration into constructing modern poems. All of these embodied their characteristic of combining the spirit of artistic innovation with the sense of times and combining both the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ity of poets, which showed their unique historical and aesthetic values. To a certain degree, their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corrected two improper trends of China's new poems. They created poems wit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modern artistic glamour by courageously combining the spirit of realism with western modern artistic approaches. In this way, they created a new roa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poems. Even today, their principles and approaches of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lity and art and that between national traditions and foreign influences are still brightening..

Key Words : Nine-Leaf Poets Group, Artistic Practice, Spirit of Realism, Modern Approaches, Combination